

SUPERCAPITALISM

天下

The Transformation of Business, Democracy, and Everyday Life

在全球化、網路化的推波助瀾之下，
無遠弗屆、無所不能的全球資本主義如
今已變成了超極資本主義。
但是，帶來的卻是財富不均擴大，
中產階級消失，就業不穩定……，
原因何在？

透視中產階級消失的真相 超極資本主義

Robert B. Reich
羅伯·瑞奇——著

李芳齡——譯



SUPERCAPITALISM

The Transformation of Business, Democracy, and Everyday Life

超極資本主義



超極資本主義／羅伯．瑞奇（Robert B. Reich）著；
李芳齡譯．-- 第一版．-- 臺北市：天下雜誌，2008.05
面；公分．--（天下財經系列；148）
譯自：Supercapitalism：the transformation of business,
democracy, and everyday life

ISBN 978-986-6759-89-5（平裝）

1. 資本主義 2. 民主化 3. 企業經濟 4. 利益團體
5. 美國

551.5952

97008657

訂購天下雜誌圖書的四種辦法：

◎ 天下網路書店線上訂購：www.cwbook.com.tw

會員獨享：

1. 購書優惠價
2. 便利購書、配送到府服務
3. 定期新書資訊、天下雜誌網路群活動通知

◎ 在「書香花園」選購：

請至本公司專屬書店「書香花園」選購

地址：台北市建國北路二段6巷11號

電話：(02) 2506 - 1635

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 上午8:30至晚上9:00

◎ 到書店選購：

請到全省各大連鎖書店及數百家書店選購

◎ 函購：

請以郵政劃撥、匯票、即期支票或現金袋，到郵局函購

天下雜誌劃撥帳戶：01895001 天下雜誌股份有限公司

* 優惠辦法：天下雜誌 GROUP 訂戶函購 8 折，一般讀者函購 9 折

* 讀者服務專線：(02) 2662-0332（週一至週五上午9:00至下午5:30）

RCAPITALISM

The Transformation of Business, Democracy, and Everyday Life

超極資本主義

透視中產階級消失的真相

Robert B. Reich
羅伯·瑞奇——著

李芳齡——譯



推薦序

重新檢視資本主義的遊戲規則

司徒達賢

經濟體系負責進行實質的創價活動，政治制度則為這些創價活動制定遊戲規則。經濟體系與政治制度互為表裡，簡言之，有什麼樣的經濟體系，就應有什麼樣的政治制度來配合，兩者配合得好，各方面就能欣欣向榮；若彼此扞格，國家的進步就會出現遲滯。

過去一世紀以來，美國的自由經濟與民主政治二者相輔相成，是造成其國力強盛、民生富足的主要原因之一。然而，本書作者指出，「市場經濟」、「自由競爭」、「私有財產」、「大眾握股」這些資本主義的運作方式，由於發展得過於極致，結果卻凸顯出現代民主制度的不足。企業為了在競爭中存活，所採取的行動甚至妨礙了民主政治的基本理想與原則。

SUPER CAPITALISM
超權資本主義

2
3

推薦序
重新檢視資本主義的遊戲規則

換言之，政治與經濟二者雖然互為表裡，但政治卻不應僅為企業服務，必須兼顧勞工、社區、環保、文化以及永續發展等社會目標的平衡，以及人類多元價值的取捨。回顧百年以來現代民主國家的經濟發展，企業的成長、獲利固然受到社會高度的關注，但經由各種勞工團體、環保團體、消費者團體的努力，加上各種立法規範，這些相關議題也得到合理重視。民主政治制度在此一期間也有效地扮演著平衡各方利益的角色。然而，當資本主義走向「超極」時，除了自由經濟所強調的「降低成本」、「滿足顧客」依然受到重視之外，其他各種社會價值都逐漸邊緣化，過去十分活躍的勞工團體、環保團體、消費者團體，影響力也日益式微。這些現象表示，政治制度早該配合這種超極資本主義而有所調整。

為了提升企業經營效率而犧牲社會的多元價值，背後的主因並非源自企業界的貪婪或經營者的道德低落，而是現代的市場競爭已走向全球化的結果。簡言之，在全球化經營時代，資金可以在世界各地自由流動，生產基地也因成本因素而在世界各地機動調整。許多國家為了提升國民就業水準，不得不降低勞動條件與環保規範等方面的要求，以吸引跨國企業的生產活動，或成為主要的採購來源國。跨國企業為了強化本身成本上的競爭力，也不得不爭相前往勞動成本、環保成本最低的地區尋找供貨來源。

面對國際間工作機會的競爭，先進國家的工會當然無法強力主張勞動條件的改善。同理，其他如環保等議題，也都無法在任何單一國家大力推動，反托拉斯法案也難以跨國執行。本書指出，美國的工資低落、失業增加、中小企業與社區零售店倒閉、社區與企業關係薄弱、社會政策難以落實等，皆肇因於

「消費者在乎價格」及「投資者要求利潤」。執行長們如果無法滿足這兩件事，其個人事業生涯勢必受到股東的懲罰。為求自保，他們的種種作為，應不意外。多數民眾在譴責企業經營者時，卻未警覺到本身所積極扮演的消費者、投資者角色，已逐漸悖離最重要的角色——社會公民。

更深入觀察還可以發現，企業為了在嚴苛的競爭中存活，不得不積極影響政策與立法方向，甚至進而支配了遊戲規則的設計。理論上，政治家與學者都應保持超然客觀、高瞻遠矚的立場，然而政治人物需要募款以從事日益昂貴的選舉，學者專家則需要研究經費，唯有企業能提供這些財力支援，結果必然影響了言論與政策的超然客觀程度。其他與企業短期獲利無關的議題，即使合乎全民長期的期望，也不容易在輿論上及公共政策上得到應有的重視。

市場競爭、上市公司、跨國經營、選舉制度、國際政治，以及每位國民在「投資人、消費者、社會公民」三種角色上的互相矛盾，種種因素，因果循環，環環相扣，形成了今日企業經營乃至於人類生活的機構環境。本書在分析上有相當的深度與創意，針對這些原因，所提出的方案也頗有參考價值。由於議題十分複雜，人類社會究竟能掌握哪些可能的解決辦法，以及每項方案的效果與副作用究竟如何，都是值得大家不斷深思的。

（作者為政治大學企業管理所系教授）

contents
目錄

推薦序

重新檢視資本主義的遊戲規則

司徒達賢

導讀

找回公民的正確角色

吳惠林

0

24

矛盾的開始

1

40

接近完美的黃金年代

靠著大量生產模式以及政府的合宜措施，美國在資本主義和民主政治間達成極佳調和，成為政治自由與中產階級豐裕的模範。

2

84

通往超極資本主義之路

過去幾十年，民主資本主義的核心機制式微，

經濟力量轉傾於消費者和投資人手中，超極資本主義時代來臨。

三心二意

一方面，身為消費者和投資人的我們期待好交易；

另一方面，身為公民的我們又不樂見伴隨好交易而來的負面惡果……。

132

被掩埋的民主制度

為了生存，企業透過公共政策取得競爭優勢，

導致民主政體回應公民議題的能力降低。

182

分歧的政治主張

抨擊企業不付社會責任，或者期待企業具有社會道德的做法，成效不大，反而誤導大眾的注意力，忽略矯正民主制度的必要。

220

公民自救指南

民主程序才是解決所有問題的工具，而非指望企業負起社會責任。

266

導讀

找回公民的正確角色

吳惠林

自二十世紀末，全球化、知識經濟，以及新經濟等沸沸揚揚以來，全球各國普遍性的所得分配不均或貧富懸殊加重就成為熱門話題。弱勢窮苦者的生活固然惡化了，連一向佔社會多數的「中產階級」也急速萎縮，這些中產階級大都向下層移動，移往上層者相對稀少，因而雖然類似「M型」，兩頭卻非常不對等。不過，在趨勢專家大前研一的《M型社會》一書於二〇〇六年面世之後，這個名詞就大為流行，其實該書的副書名正是「中產階級消失的危機與商機」，明白表示說的是「中產階級消失」呢！值得強調的是，做為社會中堅的中產階級流失，且向低階流動，並不只是某個地區或國家的特殊現象，而是另類的「全球化」普遍現象。

中產階級正在消失

直接以《中產階級的戰爭》(War on the Middle Class)做為書名探討問題的竟然出現在美國這個世界第一大經濟強權，而且就是探討美國的問題，那是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名主持人杜博思(John Doherty)在二〇〇六年出版的。他在書中大聲疾呼「美國的中產階級正在滅絕」，因為他目睹千禧年以來美國在政府的失敗公共政策、企業的扭曲做法，以及政治失靈下，中產階級所受到的可怕衝擊。

杜博思說，在這場動盪中，美國的中產階級不是因戰爭而死亡的平民；而在這場國家重大變故中，勞動階級不是無辜的旁觀者。他認為，美國的政治、企業與學術精英，根本就是針對中產階段而發動全面戰爭。他明確指出，不論是合法或非法外勞與非法移民危機、租稅、教育，還是就業問題，現在根本沒人來遏止大企業與大政府勾結，攻擊公益，大部分的民選官員都已經被企業遊說團體與其他特殊利益團體的政治獻金收買了；說客不止影響立法，根本就是實際在撰寫法律文字。企業把生產設備移到海外，把工作委託國外廉價勞工，對美國製造業基礎造成無法挽回的傷害。

杜博思認為，政府應該強力投資中產階級、大力改善教學品質不良的學校、重建製造業基礎、恢復與整修全國基礎建設。然而，美國人卻允許最大型的企業忽視本身的社會責任，允許政府浪費千百億美元，累積驚人的債務，而且債留子孫。

杜博思又認為，中產階級沈默不語的時間太久了，根本不該再忍受下去，中產階級一直沒有發聲，抗議自己在社會中遭到物化，再這樣子下去，跟國家前途有關的所有重大決定，就會由政府、大企業與特殊利益團體的精英決定。這些精英喜歡你默不作聲，因為這樣可以讓他們自私自利地掌控國家前途。他於是對美國民眾喊話：「如果我們要看到你我都希望見到的、看到我們和子孫都珍惜的土地，就必須堅決對抗危害國人的生活方式，而且現在就必須站起來。」

中產階級站起來

杜博思不是要人民起來革命，而是要每一個勞動大眾都挺身而出踴躍投票，重振美國的參與式民主式制度，花精力和時間了解各項訊息，實際參與政治，不可再繼續對政治冷漠，更不許政客在選戰中主打族群對立問題。最好是做個獨立選民、推動公費選舉和杜絕獻金，也要有創制與複決權，將民代和官員卸任到轉任說客的期限延長，對自由貿易和外勞限制，設法讓教育再度成為翻身之路。這些主張都很動聽，但可行性存疑，而且以「中產階級的戰爭」做為訴求，雖非族群對立，卻是典型的「階級對立」，因而似乎缺少一些重要元素。到底是什麼？直到這本《超極資本主義》出爐，才有較合理的答案，也終於讓世人了解正確的做法。

其實，在這本柯林頓主政美國時期的勞工部長瑞奇的著作面世前，一九九七年七月亞洲金融風暴期間聲名鵲起的全球知名經濟學家克魯曼(P. Krugman)，最近也在其《下一個樂景》(The Conscience of a Liberal)這本新書中，就美國的貧富差距擴大、中產階級崩落、金權政治等諸多問題提出針砭，但他將矛頭對準保守主義的布希政府，緬懷小羅斯福總統「新政」時期，主張政府應負起「社會福利」重責大任，而且明確提出應最先實施「全民健保」政策。不但是十足的「凱因斯主義」，還有濃厚的社會主義味道，恐怕非但解決不了當前的問題，還會衍生出更多的後遺症。

相對地，瑞奇的這本書，就很平和地敘述美國這個全球資本主義、自由民主典範國度的政經發展史，精采地描繪出它的成就。在與共產主義的對抗中，美國資本主義勝出，如今已散播到幾近世界每個角落；大多數國家已成為單一整合的全球資本主義體系的一部分，東歐已經被吸收加入資本主義歐洲，俄羅斯也逐漸變成一個資本主義強權；中國雖名義上仍是共產國家，實際上已經變成全球資本主義的溫床。

瑞奇評論說，幾乎在任何人的定義中，這一切都是十足的勝利。

不過，一些觀察家卻正確地指出，這些收穫所付出的代價是所得與財富的不均擴大。伴隨而來的其他問題還包括就業不穩定性升高，以及對環境的破壞——例如全球暖化問題。但瑞奇卻認為，嚴格地說，這些並不是資本主義的缺失，資本主義的角色是擴展經濟大餅，至於要如何分配這塊大餅，以及是否要

推及私有財（例如個人電腦）或共用財（例如乾淨空氣），全憑社會決定，而這是民主制度所要扮演的角色。

超極資本主義的龐大代價

在瑞典的眼中，民主制度是為了達成那些只能靠公民結合起來共同達成之事——也就是決定怎樣的遊戲規則，才能夠照顧到共同福祉。這些遊戲規則當然會影響經濟成長速度，例如，某項非常極端偏重均分大餅規則將抑制個人在儲蓄、投資及創新方面的動機；相反地，另一種規則或許就比較偏重促進經濟成長。民主制度的原旨是要幫助我們做出這種取捨、幫助我們同時達到成長與均富，或是達成我們的其他共同目標。

瑞典感慨說，如今的民主制度正陷入執行這些基本功能的困難窘境中。在貧富不均擴大的同時，美國曾經用以減輕此問題的工具——例如累進所得稅制、優良公立學校、能談判出較高工資的工會等等——均遭到侵蝕而式微。在突然失去工作或收入的風險增大的同時，社會安全網變得更不可靠，愈來愈多人沒有健康保險。此外，美國似乎也未能在減輕世界氣候變遷問題上盡心力。同時，許多美國人也關切當代文化的低俗粗劣，憂心城鎮主街和其周邊社區的消失。在所有這些層面，民主制度都未能採取有效行

動，甚至未能清楚闡明採取或不採取有效行動將牽涉到的取捨與犧牲。

瑞奇發現，資本主義變得更側重回應我們身為產品消費者的需求，但民主制度卻變得愈來愈不回應身為公民的我們的共同需求。他問說：「為何資本主義變得如此成功壯盛，而民主制度卻變得如此衰弱無力？這兩種趨勢彼此關聯嗎？有沒有什麼方法可以強化民主制度呢？」

瑞奇提供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基本概念：在過去數十年，我們身為公民的力量減弱了，同時我們身為消費者與投資人的力量卻增大了。

瑞奇也和克魯曼同樣觀察到，在掙扎度過大蕭條難關後，美國的經濟和民主制度運轉良好，全體國民普遍共享空前的繁榮，雖稱不上是黃金年代，但每一所得群和社會階級都受惠，所得與財富不均的情形明顯改善，數量龐大的中產階級崛起。稍後，在歐洲與日本，數量龐大的中產階級也崛起。大多數美國人對美國式的民主制度甚具信心，同時，他們家中新添購洗碗機、電冰箱、電視機、音響，車庫裡或車道上停放著各種牌子的汽車。資本主義和民主制度成功地攜手並進，兩種制度幾乎合而為一，被瑞奇稱為「美國式民主資本主義」，並且被當成世界的模範，以及有別於蘇維埃共產主義的另一種選擇。

在這種體制下的產品與服務穩定而可預測，也比較集中於少數大公司。為了取得龐大的規模經濟，大公司需要可預測性、穩定性和最低的競爭程度。此外，也需要藍領工作者的合作意願，因為罷工或停工會干擾生產流程順暢性，因此公司同意把較高比例的公司獲利分配給員工。（員工多半參加產業工會）

這些大公司在經濟體系中扮演如此大且顯著的角色，以至於它們也需要來自社會大眾的支持。所以，企業樂於跟政府協商如何分配經濟成長帶來的更多利益，同時也保護就業、社區和環境。這些協議中，有些是在管制當局內部達成，有些是在立法機構達成，有些則是透過扮演「企業政治家」角色的公司執行長居中斡旋協調而成。這是實現「共同利益」的圖象。

不過，這種比較穩定且公平均等的境界，代價是消費者與投資人的選擇非常有限。他們得歷經相當的困難，才能找到更好的交易；重大的產品創新相當少，汽車車身加長了，車窗裝飾得更華美了，顏色選擇增加了，但基本的技術並沒有太大的改變。投資人也傾向消極被動，鮮少移動資金，因為幾乎所有投資類別提供的報酬率都大致相同，道瓊工業指數也慢條斯理地沒什麼明顯進展。

七〇年代以後，這種情形急劇改變。大公司變得更具競爭力、更全球化、更創新，這就是瑞奇所謂的「超極資本主義」誕生了。在這種轉變過程中，身為消費者與投資人的我們獲得了更好的待遇，經濟力量明顯增大；但身為公民的我們，謀求共同福祉的能力卻削弱了。這種轉變始於美國政府為打冷戰而發展的技術被應用於新產品與服務中，為新競爭者創造了可能性與機會。首先出現在交通運輸業、通訊業、製造業和金融業。這種原本穩定的生產體系被撼動、敲開的變化始於七〇年代末期，爾後快速擴展，迫使所有公司更加激烈地競爭顧客與投資人。大型零售業者把消費者的力量結合起來並增大，利用龐大數量消費者的集體議價力量，向供應商爭取到更實惠的交易。大型退休基金和共同基金把投資人的